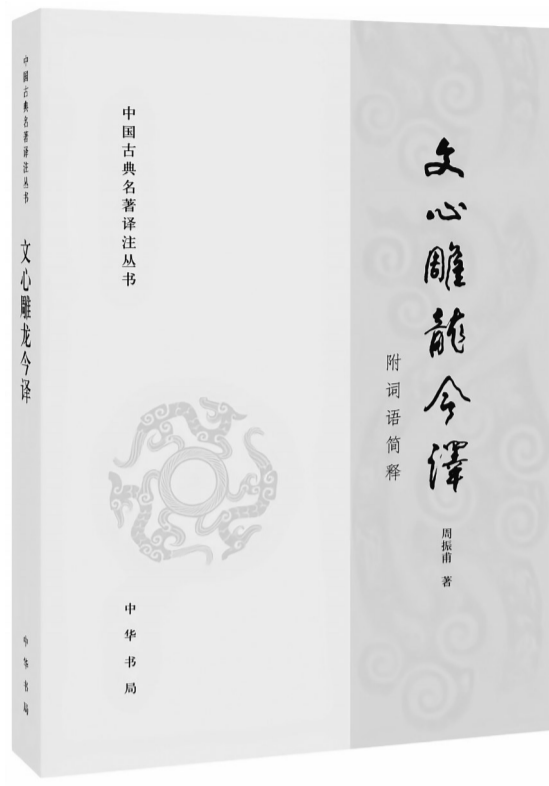


# 周振甫：从编辑到学者的文化传承

■ 季小英



周振甫



周振甫著《文心雕龙今译》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32年。当时上海开明书店承接了朱起凤《辞通》的出版工作，这部汇集古书中通假词的巨著需要精通古籍点校的人才校对。开明书店的徐调孚先生听闻无锡国专有位名叫周振甫的学生功底扎实，便寄去一本《老学庵笔记》，测试其断句能力。周振甫的答卷精准严谨，顺利通过考核。就这样，尚未毕业的他怀着对典籍整理的热忱，离开无锡前往上海，开启了长达六十八年的编辑生涯。

## 开明淬炼：编辑生涯的初心坚守

1932年秋，周振甫踏入上海开明书店的编辑室，这里汇聚了夏丏尊、叶圣陶、王伯祥等一批兼具学识与情怀的文化大家，形成了“尊重学术、善待作者、严谨务实”的出版传统。在这样的环境中，周振甫从最基础的校对工作做起，逐渐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编辑，也铸就了他一生坚守的职业品格。

校对《辞通》是周振甫编辑生涯的起点，这部耗时三十余年写成的著作，收录了数万条古汉语通假词例，校对工作繁琐且艰巨。朱起凤先生的原稿字迹不易辨认，许多引文出处需要逐一核查，周振甫每天埋首于古籍堆中，对照《说文解字》《尔雅》等工具书逐条校验。有时为了一个通假字的出处，他要辗转借阅数种善本，直到确认无误才肯罢休。这段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编辑工作没有捷径，所谓功底，就是把每个疑点都弄清楚的耐心。”在校对过程中，他还从王伯祥等前辈身上学到了“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的道理，养成了反复核查、绝不敷衍的工作习惯。

除了《辞通》，周振甫还参与了《二十五史补编》的校对工作，这部汇集历代史家补注成果的巨著，涉及史学、文献学等多个领域。为了确保校对质量，他系统学习了正史体例与史学考据方法，甚至利用业余时间通读了“前四史”。这种“以校促学”的方式，让他的学术功底日益深厚。1935年起，他开始参与编辑工作，在王伯祥的指导下负责吕思勉《中国史》、童书业《春秋史》等史学著作的校编。他不仅纠正书稿中的史实错误，还会就篇章结构、引文出处等提出修改建议，这些建议常常因切中肯綮而得到作者的赞赏与采纳。

在开明书店，周振甫不仅锤炼了业务能力，更确立了“为作者服务、为读者负责”的编辑理念。叶圣陶先生“编辑要做作者的益友，读者的忠臣”的教诲，成为他一生践行的准则。他对待书稿不分名家新人，均一视同仁；对名家著作不盲从，敢于提出修改意见；对新人稿件不轻视，耐心指导完善。这种态度让他赢得了作者的信任，也奠定了他日后与钱锺书等学者学术交往的基础。

抗战期间，上海局势动荡，开明书店的出版工作举步维艰。许多员工选择离开，周振甫却坚守岗位，冒着风险参与《中学生》杂志的编辑，通过发表文史知识文章，为战乱中的青少年传递文化薪火。这段艰难岁月里，他还利用有限的条件编写了《班超》《东林党锢》等通俗历史读物，既普及了历史知识，也锤炼了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1947年，他迎来了编辑生涯的重要时刻——担任钱锺书《谈艺录》的责任编辑，这段经历不仅成就了一部学术经典，更开启了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学术交道。

## 编研相长：学术与出版的双重绽放

1947年，钱锺书将《谈艺录》手稿交给开明书店，这部融中西文论于一体的著作引经据典、晦涩难懂，编辑起来难度极大。周振甫接手后，不仅逐字逐句校对原文，还通读全书梳理逻辑脉络。他发现书稿没有目录，便主动根据内容编排了详细目录，方便读者检索。钱锺书看到后大为赞赏，在序言中特意提及此事，称他“重劳心力”，还题辞感叹：“校书者非如观音之具千手千眼不可。此作蒙振甫道兄劬劬，得免于大舛错，拜赐多矣。”

这段编辑经历展现了周振甫“学者型编辑”的鲜明特质——不仅能完成校对、编目等基础工作，更能从学术高度理解书稿价值。他在编辑过程中写下的批注，既有对引文错误的订正，也有对文论观点的补充，这些见解让钱锺书大为认可。更难能可贵的是，当钱锺书提出从稿费中分出部分作为酬劳时，周振甫坚决拒绝，这种不沾纤尘的文人风骨，让两人的学术交往始终保持着纯粹与尊重。

1952年，开明书店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周振甫随之北上，从事古代文史著作的编辑工作。当时出版社的工作相对清闲，他便利用工作时间系统整理自己的编辑心得与学术思考，并于1961年完成了《诗词例话》的写作。这部著作以“例话”形式，结合具体诗词作品阐释创作理论，既有学术深度又通俗易懂。经编辑室主任批准出版时，他主动提出因利用工作时间撰写，放弃全部稿费。这部书后来成为经典读物，累计发行量达70多万册，至今仍被用作古典文学教学的重要参考书。

在中青社期间，周振甫还承担了毛主席诗词和鲁迅诗歌的注释工作。为了准确诠释诗词中的历史背景与文学意象，他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走访相关专家请教。他的注释既注重史实准确性，又兼顾文学性，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这段经历也让他对“以今释古”的注释方法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段经历进一步锤炼了他注释经典的能力。

1971年，周振甫迎来了编辑生涯的又一

重要转折。当时中华书局正在开展“二十四史”点校工作，《明史》点校需要熟悉古籍整理的人才，他被借调参与此项工作。《明史》卷帙浩繁，校勘记的复核需要对照《明实录》等大量文献，工作极为繁重。周振甫与郑天挺先生合作，逐条核查校勘记，纠正了多处错误。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因被下放到河南潢川农场劳动，工作一度中断，但即便在田间地头，他仍坚持背诵古籍，整理读书笔记。1973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二十四史”点校工作恢复，他被紧急召回北京，继续参与《明史》整理。在白寿彝先生的主持下，他重新梳理校勘记，完善标点符号，为这部史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1975年9月，周振甫正式调入中华书局，从此在这家百年书局开启了学术创作与编辑工作的黄金时期。

## 中华巅峰：典籍整理与工匠精神

进入中华书局后，周振甫如鱼得水，在古籍整理与学术出版领域达到了新的高度。这里浓厚的学术氛围与专业的出版传统，为他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平台。他先后参与了多部重要典籍的编辑与整理工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担任钱锺书《管锥编》的责任编辑。

1979年，钱锺书将《管锥编》手稿交给中华书局，这部学术巨著涉及中外典籍数千种，引文纷繁复杂，编辑难度远超《谈艺录》。周振甫接手后，首先通读全书，耗时三个月梳理出详细的内容提纲，然后逐章逐节进行审读。他不仅核对每处引文的出处，还对书中涉及的冷僻知识点进行考证。对于书稿中存在的歧义之处，他不仅仅是简单修改，而是写下详细的审读意见供作者参考。他的审读报告长达38页，第二次审稿意见更是用蝇头小字写了40余页，字里行间满是严谨与认真。钱锺书在这些意见上写下了“遵改”“甚是”“精密极矣”等批注，对他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认可。与编辑《谈艺录》时一样，周振甫又主动为《管锥编》编制了详细目录，这份目录极大地方便了读者的研读。

周振甫的“工匠精神”在中华书局期间得到了充分彰显。据他的同事回忆，周振甫在谈及编辑经验时，始终强调“认真”二字。这种认真不仅体现在对名家著作的编辑中，更贯穿在每一项工作中。1983年，年轻编辑赵伯陶责编一部桐城派文集，请周振甫复审。他在审稿意见上写下了密密麻麻的批注，其中“再查一下”四个字让赵伯陶铭记终生。后来赵伯陶将这四个字作为座右铭，感慨道：“这四个字看似简单，实则是精益求精的治学编书之道，让我受益终身。”

这种严谨认真的态度，在非本职工作

中同样体现得淋漓尽致。柴剑虹等同事撰写《乐府诗名篇赏析》时，请周振甫审阅并作序。这部不到10万字的书稿并非他的分内工作，但他逐篇细阅，写下几十页的修改意见，从注释的准确性到赏析的文学性都提出了具体建议。有一次，一位韩国艺术家想在中华书局出版汉文诗集，周振甫不仅为其估算印数与费用，还复制钱锺书诗集样张供参考，更在读完书稿后提出详细修改意见。这些看似琐碎的工作，彰显了他“编辑无小事”的职业理念。

在从事编辑工作的同时，周振甫的学术创作也进入了爆发期。他先后出版了《文心雕龙选译》（1980）、《文心雕龙注释》（1981）、《谭嗣同文选注》（1981）等著作，其中《文心雕龙注释》被誉为该典籍注释的经典版本。这部著作既注重原文的准确解读，又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解决了许多长期存在的学术争议。80年代以后，他又陆续推出《文章例话》《文学风格例话》《中国文章学史》《中国修辞学史》等力作，形成了系统的文学理论与文献学研究体系。他的研究始终坚持“以例说理”，用具体的文献案例阐释抽象理论，这与他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养成的务实风格密不可分。

1983年2月4日，中华书局与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联合为周振甫举办从事编辑工作五十年茶话会。这位从未担任过编辑室正副主任的普通编辑，迎来了120多位学界业界名流的祝贺，钱锺书、启功、吕叔湘等大家悉数到场，中宣部、文化部等部门领导也出席会议。1996年，他荣获首届韬奋出版奖，这一中国出版界的最高荣誉，是对他一生编辑工作的最佳认可。

## 薪火相传：品格与精神的永恒回响

晚年的周振甫依然保持着勤勉的工作状态，即使退休后仍坚持每天读书写作，整理编辑心得。他将更多精力放在培养年轻编辑与普及传统文化上，为学术传承贡献力量。他常对年轻编辑说：“编辑不仅是职业，更是志业，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他的言传身教，影响了一批又一批出版人。

为了让更多青少年更好地接触经典，周振甫精心节编了《三国演义》，将一百二十回浓缩为六十回，删去繁冗词句，补充说明文字，并为生字生词作注。这部适读本既保留了原著精华，又符合青少年的阅读特点，成为经典普及的成功范例。他还撰写了《毛泽东诗词欣赏》《鲁迅诗选》等著作，用通俗的语言阐释经典作品的思想内涵与艺术价值，让更多读者领略到现代诗词的魅力。

周振甫的品格如同他编辑的典籍一样，厚重而温润。他一生淡泊名利，虽著作等身、享誉学界，却始终保持着谦逊低调。他的书房朴素无华，四壁皆书，唯一的装饰是钱锺书题写的“校书堂”匾额。对于上门请教的年轻人，他总是倾囊相授，耐心解答各种问题。据他的外孙周海涛回忆，祖父与钱锺书的交往始终坚守“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准则，拒绝任何形式的物质酬谢，这种纯粹的学术友谊令人敬佩。

2000年，周振甫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这位从浙江平湖走出的文化人，用一生践行了“传承文化、服务学术”的初心。他留下的不仅是《诗词例话》《文心雕龙注释》等传世著作，不仅是《谈艺录》《管锥编》等经典背后的编辑心血，更是一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一种“淡泊名利、坚守初心”的文人品格。

如今，当我们翻阅由周振甫编辑或注释的典籍，那些精准的标点、严谨的注释、清晰的目录，无不彰显着一位编辑家的专业素养。他提出的“认真”二字与“再查一下”的箴言，依然是出版界从业者的职业指南。

从平湖的乡邦文脉到无锡的国学熏陶，从开明书店的初心坚守到中华书局的巅峰绽放，周振甫的一生，是20世纪中国文化人坚守与传承的缩影。他用自己的生命证明：平凡的岗位上，只要怀揣对文化的敬畏与热爱，坚守专业与初心，便能成就不平凡的事业，为文明传承留下不朽的印记。这种精神，在今天依然闪耀着璀璨的光芒，指引着后来者在文化传承的道路上坚定前行。

供稿：钱亚芳 张金生

## 平湖习俗·节令俗

农历五月初五，俗称“端午节”，也叫“端阳节”。端午这天平湖有很多风俗，清光绪《平湖县志》卷二《地理下·风俗》记载有云：“东湖陈龙舟水嬉。家悬神符，插蒲艾，食角黍，焚艾术，饮雄黄酒，妇女镂茧花，裂帛肖人佩之，谓之健人，幼者系彩索，佩虎符以除不祥。”

旧传五月是各种虫害出现的日子，端午除了传统的吃粽子，平湖乡间还盛行吃“五黄”，即黄酒、黄鱼、黄鳝、黄瓜、蛋黄

（咸鸭蛋），认为这样可以避“五毒”，即蛇、蝎、蜈蚣、壁虎、蟾蜍。到了正午时分，家家户户在大门上贴符纸，悬挂菖蒲、艾蓬、蒜头，意为驱邪降魔；室内用苍术、艾草、白芷熏烟，墙角撒上白石灰，以驱除蚊子、苍蝇、毒虫。家里有小孩的，要用雄黄酒在小孩额头上画个“王”字，幼儿还要戴虎头帽、穿老虎鞋，以达到驱毒辟邪求吉祥的目的。

巧妇们常常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做香

袋，香袋也叫香囊或香包。她们找来零碎布料和五彩丝线，把布料剪成菱形或鸡心形，里面装入棉花、朱砂、雄黄、香料等，一针一线缝制成漂亮的香袋，再串以各种形状的小坠子，看起来玲珑可爱，闻起来清香四溢，既能装饰点缀，又可避邪驱瘟。鸡心形的香袋常用于小孩佩戴，因为“鸡心”和“记性”谐音，认为小孩挂了鸡心袋，读书记性好，将来有出息。平湖还有一句俗话说“跟来跟去像只香袋”，足以说明人

们对香袋的喜爱。

平湖的龙舟赛由来已久，《平湖竹枝词续编》记载，清代诗僧释元璋曾有一段时间住在东湖边，将看到的景象写成了诗：“端午湖中吊屈原，龙舟竞渡跃龙门。烟波占断闻箫鼓，惊起鸳鸯过马园。”后来又出现了更具地方特色的摇快船比赛，摇快船的船只，即江南水乡常见的农用水阻，船体稍长，船头上翘，船底呈弧状，涉水阻力小，急摇时左右稳定性较差，因此摇快

船具有快速惊险的特性，船手均以抢到“头船”为荣。每当夏收夏种结束，黄梅上岸，端午将至，乡间精壮男儿便搭班轮船，组队操练，到了端午这天，齐聚东湖划艇表演，自找强队进行比赛。只见湖面上一只只快船桨飞檐舞，船头白浪翻滚浪花四溅，两岸人群欢呼雀跃高喊助威，场面十分壮观，成为江南水乡的一道文化盛景。